

论中共建党初期对农民阶级的革命动员 (1921—1927)

刘大禹,侯明月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中共建党初期,亟需解决革命力量的来源问题,即党需要组织谁、依靠谁的问题。中共建立后,重视农民问题,尤其在领导工人运动遭受挫折后,积极寻求革命同盟力量,对农民阶级进行多种形式的革命动员,组织和领导农民阶级参与革命。中共通过简洁明了的方式,深入农村,宣传革命理念;组织农会,壮大革命力量;关注基层,强调政治斗争目标。大革命时期,中共掌握了对农民革命动员的主导权,为其后开展土地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农民阶级;革命动员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2)04-0011-11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民阶级一直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土地问题成为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决定要没收土地”,^[1]1925 年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工人阶级应该努力去领导农民来参加这个斗争……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2]可见,中共建党初期认识到农民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对此,学术界已有了一些研究成果。^①然而,中共建党初期如何对农民阶级进行革命动员,并最终过渡到土地革命,却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此作一论述,以管窥中共革命动员的策略及其成效。

一、动员缘起:重视农民力量与实现工农联盟目标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旧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陈独秀、蔡和森和邓中夏等早期中共党人意识到,中国社会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蔡和森言:“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3]然其时各种救国思潮纷纷涌现,要脱颖而出并不容

[收稿日期] 2022-02-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JZD038)。

[作者简介] 刘大禹(1972—),男,历史学博士,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国共关系史。

侯明月(1998—),女,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① 王明前:《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与早期农民运动实践》,《观察与思考》,2013(09);孟庆延:《“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社会》2017,37(03);杨林生:《浅论李大钊对农民问题认识的转变》,《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04);邱春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认识的历史考察(1921—1927)》,《山东师范大学》,2003 年;柳礼泉:《邓中夏对早期农民运动的理论贡献》,《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01)。

易。陈独秀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4]116-117}处于襁褓中的中共,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必难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任务。面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组织谁,依靠谁,这是党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然而,建党初期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为己任的中共党人,何以会重视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并加强动员呢?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代封建王朝均十分重视农民问题。为维系统治、缓和阶级矛盾,历代都出台过诸如“均田”“减赋”等政策,但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农民始终承受残酷压榨,一旦越过临界点,“民不堪命”就会变成“揭竿而起”。史不绝书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翻了一个个王朝,也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可惜秦末至清季,农民命运未能获得实质性改观。鸦片战争后,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与压迫,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又兴,兵燹饥荒连绵不绝,农民赤贫益发加剧。近代以来,中国农民也力图以抗争改变命运,掀起过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尽管展现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却无一例外遭到失败。究其根本,是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无法以单纯的农民战争完成已经卷入近代世界的中国革命之任务。

其实,农民阶级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早为马克思主义者所高度重视。有关农民的革命力量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较多论述。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农民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极其重要的因素。”^[5]列宁谈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革命时,认为“最本质的问题即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联盟。”^[6]列宁说,无产阶级“是正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的阶级基础,在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只有非常巧妙地,谨慎地和逐渐地同绝大多数农民结成联盟,才能顺利完成过渡这一任务。”^[7]中国是一个尚未经过工业革命阶段的国度,工人阶级人数相对较少,但最集中,革命性最强,如果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紧密结合,就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需的两个最根本问题,即革命的领导阶级与革命主力问题。农民阶级因其分散与认知相对不足的属性,并不能轻易实现其利益诉求,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领导,强化其组织,升华其革命意识,才能彻底完成命运之转变。工人阶级只有结合农民阶级,将农民阶级视为革命的主力军,充分动员人民力量,才能实现社会革命的胜利。正如李达所指,“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底大多数……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8]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共对农民阶级的认识逐渐深入,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有所体现。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十五条中有两条提到农民:第三条“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第十条“工人、农民、兵士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较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来工作”。^{[1]3-4}如果说党的一大认为革命中心是工人运动,对农民阶级的认知尚为模糊,到1922年中共二大时,这种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中共判断“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113}换言之,当受压迫的农民经过革命动员,主动参与革命斗争时,革命就有胜利的希望。当然,其时中共对于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尚未有具体方略,也未进行深入讨论与实践,更多停留于相对浅显的层面。

比起中共高层对农民的忽略,部分中共领导人和积极分子走得更远一步,他们在实际的革命活

动中体会到了农民群体隐含的巨大能量,意识到在农村进行革命大有可为。他们尝试组织领导农民,唤醒其阶级意识,以鼓动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开展农民运动,这些共产党员的单打独斗,却意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为突出的是沈定一(玄庐)领导的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彭湃领导的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毛泽东领导的衡山岳北农民运动。

1921年3月至4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沈定一,在其家乡浙江萧山衙前开展农民运动,同地主阶级展开反对地租的斗争,取得一定胜利。但这种小规模武装斗争,几乎未能对封建根基形成冲击。当年12月18日,反动军警封闭和捣毁了衙前农民协会机关,农民领袖李成虎被捕,在狱中遭凌虐而牺牲。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民运动,是1921年下半年在广东开始的海丰农民运动。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彭湃,在广东海丰组织农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的革命团体,并于1923年成立海丰总会,彭湃也于当年加入中共。农会会员中大部分是农民,包括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尤以佃农为最多,也有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小商人及小手工业工人。海丰农民运动的浩大声势及其经济要求,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震动。海丰地主成立“粮业维持会”,以对抗农会,该地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海丰农会于1924年被陈炯明解散,但其传播的观念对已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造成了冲击,对国共两党此后开展农民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3年4月,以毛泽东为主要负责人的湖南党组织派水口山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到达衡山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于9月中旬成立湖南第一个农会——湖南衡山农工会,岳北不久会员达万余人。^[9]

在此基础上,如何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并进行有力领导,逐渐成为党的工作重心。中共从国情出发,决定从促进工农联合、加强农民阶级的革命宣传与教育等方面入手,整合革命力量,领导农民协会展开斗争。

一般而言,在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各国,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泾渭分明,没有必然、紧密的联系,但在中国,农民和工人有结成天然联盟的有利条件。在外来资本冲击与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为谋求生存而转化成为社会底层的工人,主要集中在沿海及内陆中心城市,忍受着非同寻常的低劣工作条件。从小处而言,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都要求改善工作与生存条件,提高生活待遇;从大处而言,都要求进行颠覆性的社会革命,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这就注定了他们有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要求。

中共动员农民参与革命,也是客观斗争需要使然。建党初期,中共基于自身独立性的立场,并不提倡与其他团体建立联系。1923年2月7日,中共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却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工人组织遭遇重创,罢工运动的高潮一度成为“最后一个怒涛”。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如果工人阶级不主动联合其他力量,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就难以完成。而此后开展的国民革命,更是不能忽视农民的力量。如彭湃指出:“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农民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工人。我们工人要革命成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工农联盟。”^[10]对此,共产国际曾于同年5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信》中专门指示中共,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这个指示,已经超越了把农民看作工人革命运动的同盟军这一层面,直接指向了剥削与压榨农民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根基——土地问题。

二、动员武器:高度重视宣传与组织

中共对农民阶级的革命动员,是促进工农联盟的过程,更是激发农民的阶级意识与政治斗争的过程。1923年中共三大明确指出:“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1]165}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说道:“辛亥革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11]为此,中共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合理运用宣传与组织这两种武器,领导农会开展斗争,大大激发了农民阶级从事革命斗争的热情。

革命宣传是强化动员最有效的工具,有助于升华农民阶级的革命意识,使农民主动向革命组织靠拢。早期中共党人重视宣传在革命动员中的重要性,虑及农民文化素养普遍偏低、农民很难理解革命的系统理论,因此,多采取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农民领悟朴素的革命真谛。陈独秀在《前锋》中刊登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提出对农民“宣传以‘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口号。”^[12]1923年11月,中共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提到:“农民间之宣传大致与工人中相等,但材料当取之于农民生活;尤其要指明农民与政治的关系,为具体的经济改良建议之宣传,如协作社、水利改良等,尽可能用外国译语,只求实质能推广农民运动。”^{[4]353-354}时有论者建言,“宣传口号因各处情形不同,一定要根据实际调查所得者,而以最简单方言出之。”^{[13]53-55}

传单是一种最简洁有效的革命宣传方式。1923年,彭湃成立的海丰总农会印发《农会利益》传单简洁明了,如“凶年呈请减租、防止勒索、防止内部竞争、救济孤老、防止盗贼和抵抗战乱”等,在“抵抗战乱”一条中,如“前年桂军入赤石,放火残杀,一任所为。我小民何辜,受此惨痛。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14]这些传单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有助于激发农民对现实不满的反抗意识,启蒙农民阶级的革命思想。

如果说,上述的宣传内容尚停留于解决实际问题、回应现实诉求层面,那么,随着宣传的深入进行,共产党人注重适时引导农民阶级积极参与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之中。1925年5月30日,英国开枪射击声援工人的学生,13名学生被当场打死,10余人学生受重伤,150多名学生被逮捕,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成为激发人民群众从事反帝斗争的现实教材,湖南的农民运动正式组织起来,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列强,洗雪国耻”的爱国口号,以秘密农会为基础,并发动群众,在韶山积极响应,成立了公开的爱国反帝群众性组织——雪耻会^[15]。雪耻会的宣言通俗易懂:

不好不好真不好,洋人杀到眼前了。讲起此事莫伤心,大家听我说分明。东方有个日本国,想必人人都晓得。自从乙丑四月底,青岛纱厂罢工起。日本鬼子真凶横,杀死工人顾正红。上海同胞都不服,游街讲演各各哭。英国巡捕没良心,拿起枪炮就打人……莫把粮食对它送,冒的饭吃是死症。果然都是这样行,洋人自然跑的成。^[16]

雪耻会通过易于传播的歌谣,向农民揭露帝国主义的恶行。雪耻会成员公开演讲、演戏、散发传单,号召农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促长了农民阶级的革命热情。

组织也是中共对农民阶级进行革命动员的有效方式。农民阶级在旧式斗争中屡遭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其往往缺乏严密坚定的组织。组织并非自发生成的,它需要有高超的组织者及相应的组织架构,其革命目标对相关革命成员要具有足够的吸附力。组织者“组织的时候,要自己处

于负责人地位,不可持旁观态度,尤其是要比农民努力一倍,才可以指导训练农民”。^{[13]53-55}对农民的组织,“最要紧的自然组织农会——或佃农协会或雇农协会。因为必有这种机关,然后散漫的农民才可团结起来。”^[17]

1921年澎湃成立的海丰农会,是中共尝试组织农民从事斗争的一个典型示范。澎湃经过细致的工作,加入农会会员日益增多,“乡村的政治势力,已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至1922年9月,海丰赤山约加入农会的会员约有500余人。1923年成立海丰总农会,澎湃为会长,加入农会有2万农户,管辖人口10万人,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18]面对众多的农民会员,海丰农会建立了初步的组织机构,下分卫生部、教育部、庶部、交际部、财政部、总裁部、宣传部、农业、文牍等部门。农会存在前后一年,被海丰县长王作新解散,其后重新成立,又遭陈炯明解散。海丰农会瓦解的原因,在蔡和森看来,“不免染着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而且内部的组织不从基础上着想,只是一乡一乡的组织起来,故被陈炯明拘捕几个上部的办事人便冰消瓦解了。”^[19]蔡和森道出了海丰农会这一组织所存在的不足,它还只是一个松散型的地方性组织。海丰农会属于自下而上形成的组织,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但因它所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被各地农民运动所效仿,由广东一省而波及其它地区。面对势头日盛的农民运动,中共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加强了对农会的组织与领导。

当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国共两党在开展农民运动方面形成了交集。国民党受俄国顾问鲍罗廷之影响,且以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给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经了这次之后,国民党也看到农民运动之必要。”^[20]国民党成立的广州政府有了第一次有关农民运动的宣言,即1924年孙中山以大元帅府的名义发布宣言,表示农民欲解除所遭受之痛苦,“应即时组织农民协会”“此种农民协会之性质,为不受任何拘束完全独立之团体”。^[21]农民协会可以组织农民自卫军,通过武力保卫自己的权益。7月3日,广州政府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力培育农民运动干部。很快,广东有了系统的农民运动,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强调了党与农民组织的结合,二是强调农民运动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与军事层面。

很快,广东农民运动再次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譬如,中共党员周其鉴被任为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特派员,到广宁县领导农民运动。周其鉴以广东农会筹办人名义,提出三个口号:(1)恢复农会;(2)照章程组织;(3)减租。1924年8月至11月,周其鉴深入农村,普遍宣传“减租”,向农民讲解中国时局,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团结起来,以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在周其鉴和澎湃的带领下,通过多方工作,广宁农民加入农会热情高涨,声势大振,并在广东全省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到1925年2月,广东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到21万人。

广东农民运动组织并非通过命令方式成立,而是由乡入县,由县农会组织省农会。农民组织因有党的参与,注意组织的严密性与斗争的政治性,比起1923年海陆丰农民组织已是极大的进步。蔡和森不吝盛赞,认为广东农民运动“不仅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而且最足以显明工农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的影响与特性”。^[19]

当广东农会组织发展迅猛之时,湖南农会在毛泽东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养病,利用此次机会,积极推进农民运动。毛泽东在韶山,首先与农民交心,了解农民之所需,利用结婚、丧葬等各种群众聚集活动,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启迪民众觉悟,促进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建立秘密农会。

值得注意的是,当农民的革命意识不断升华与农会组织不断扩大之时,中共适时加强对农民的领导,成立党的支部,使党的组织基础与农民革命力量的发展相得益彰。譬如,1925年6月,中共韶山支部诞生,毛福轩为支部书记,从而使韶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农会组织也得到了迅猛发展。至1925年10月,韶山地区成立农民协会30多处,会员8200余人。年底,共产党员发展到110余人,建立了总支委员会。^[22]

上述是中共在广东、湖南两地对农民阶级进行革命动员的缩影。在国共合作初期,随着革命的推进,全国诸多省份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数量飞速增长,据1927年6月的调查,全国农民协会会员,以湖南、湖北、广东三省最多,共计达到了900多万。^{[23]66}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全面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三、动员分歧:走向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路

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及国民革命的进行,中共继续深入动员农民参与革命,与国民党发生了动员分歧,中共虽出现了右倾错误,但也开启了走向独立动员农民革命的道路。

如上所述,国民党为推动国民革命,宣称有督促全国国民加入国民革命运动之使命,因此,必须动员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革命。孙中山说,“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国民党一大即确定了农民运动的政纲,在宣言中指出,“一方面,对于农夫工人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其日趋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由党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之不断之努力,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23]17}

国民党对于农民运动,主要强调以国家或政权的力量去改良农村组织和增进农民地位,为此,各省省党部均设立农民部。国民党二大基本贯彻孙中山所主张的“由农民自己去斗争,国家处于援助地位”,在政治上,引导农民,使其成为有组织的民众,以参加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明确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是农民革命。吾党为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惟有首先解放农民;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均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24]这是国民党在左派和中共的共同努力之下所做出的判断。廖仲恺言:“国民革命之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到农民大多数瞭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25]

与此时的国民党相比,中共在动员农民参与革命方面拥有优势,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既有深厚理论根底又富于实践经验的群体。国民党改组后,1924年1月,国民党中央在广东设立农民部,林伯渠为首任农民部部长,彭湃任秘书,农民部还有其他共产党员罗绮园、阮笑仙、周其鉴等。5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林伯渠任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还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但实际上由中共负责,六届主任和所长与大部分教员由共产党人担任,该所名义上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但中共主导了该所的实际领导权,培养了大批的以广东籍为主的农民运动干部。这些农运干部,奔赴全国各地,深入农村,动员农民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正如邓中夏所言,“中国农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觉时期了”“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26]

在理论上,中共组织和动员农民问题亦有了长足进步。1923年底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停留于认为“农民是革命的动力,但并非革命的主力”的判断。然而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中共已认识到,农民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在中共

的动员之下,农民参与革命的热情不断高涨,其革命要求转向了政治与社会层面。

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共两党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开始渐行渐远。国民党在宣言、决议案等方面看似重视农民运动,在实践中却是忽视的。以河南省农民运动为例,当时仅由国民党各县市党部指定同志,就近到沿铁路地方,作一种调查工作,接后才慢慢的进行到实际组织方面。至1926年,在108个县的河南,仅仅只发动了10余县之农运,而成立县农会者又仅4县。^[27]当然,农会的真正发展乃是在北伐入湘之后,农运基本由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名义、在农民部的指导下推进的。

中共推动农民运动的地区,却完全呈现出另一番景象。1927年开始,农民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湖南、湖北、江西。如湖南农民运动,1925年下半年在北伐军未入湘以前,农民运动多秘密进行,1926年七八月间,农会会员只有10万人。然而,随着北伐的顺利进军,湖南农会会员猛增,据1927年4月报告,湖南省有农会组织的有63县,会员达500余万人,农民起来者近1000万人,其分布区域以湘江流域为中心,滨湖各县及资江流域次之。^[28]他们并不仅仅停留于减租减息之类的经济要求,而是提出掌握乡村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的要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言:“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倒在泥沟里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完全剥夺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29]

中共推动农民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右派颇感不满。国民党主流媒体提到,“依五个月以来之经验,发现本省各地农民运动,多不免在稚之病,其所提口号,如打倒地主,以及关于干涉政治等,在目前都失之过高”。^[30]国民党甚至攻击共产党假借国民党名义与政权去做他们自己所需要,促成无产阶级暴动的农民运动,“其结果是引起了农村的大扰乱,满足了共产党某种意义的要求以外,于国民革命的前途是无所裨益”。他们攻击毛泽东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是农民协会的权力是无限制的,其他各级党部及政府,都不必要;二是行使这个最大权力的人,就是赌钱做贼无所不为的人,所谓民众的训练,真是废话。我们认为他‘过火’,在共产党不过是恰到好处,或者竟嫌其过于和平,也未可知。”^[31]

受此影响,中共党内陈独秀、张国焘等负责同志对此颇为忧虑,他们担心农民运动“过火”而影响两党合作关系。1926年9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运动议决案》,该案指出“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但决议对于宣传问题、农民与政党关系问题却显得右倾,决议指出,“切忌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农村中阶级关系极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在考虑农民与国民党关系时,指出,“各种农民组织不必带有政党色彩,不必用政党名义去做”。^[32]陈独秀等虑及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经常“劝诫同志,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拿到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33]

与中共的忧虑让步相对的,是国民党愈发直露的分裂行径。1926年5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明确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中共党人从国民党高级别的领导岗位上退位。随后,由中共党人谭平山担任的组织部长为陈果夫取代,而林伯渠担任的农民部长为甘乃光取代,毛泽东担任的宣传部的职位为顾孟余取代。

1927年国共分裂时,国民党制定的农民运动相关纲领,与中共的主张背道而驰。如江苏省党

部就明确“严密农民运动的组织,防恶化分子共产分子乘机插入”。因此,尽管他们在宣传上仍保留“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调查农民团体,指导援助农民团体之组织”等等举措,^[34]实则狐疑防范,背离了农民群体的真实诉求,在事实上丧失了对农民运动的指导。中共在动员农民问题上虽然遭遇了挫折,党内亦产生了分歧,但更加注重对群众运动的组织与领导,走向了独立领导农民革命的道路,“对我们党组织来说,整个这一危机的积极后果就在于取得更多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我们的同志被迫离开政权机关和国民机关后,更加深入到党的共产主义工作中去了,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了,在群众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35]456}当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后,中共因有群众的支持,对农民阶级的革命动员更加显示出了组织优势。

四、动员成效:为开展土地革命奠定基础

由上所述不难发现,建党初期,中共对农民阶级的革命动员,经历了认知与实践逐步深入的过程,并在北伐期间将农民运动推向高潮。在中共的动员之下,农民阶级的斗争领域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从自发斗争上升到自觉斗争。大批农民加入党的组织,壮大了中共领导革命运动的群众力量,为其后开展土地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早已认识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如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决定要没收土地”。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以及1923年7月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均提及了土地问题。然而,如瞿秋白所言,中国革命的初期,共产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农民土地问题,就绝对没有注意——没有农民问题的政纲。他认为当时注意在“反帝国主义运动”。1925年到1927年农民土地革命的发展,是“违背着”党的意志,“反对着”党的意志而进行的。^[36]瞿秋白此言或不准确,但其表达了欲真正动员农民,必须要高度重视农民阶级最切身的利益即赖以生存的土地,并应上升到政治层面的重要性。毛泽东也说:“‘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9]163}

在国共关系因国民党实行清党而破裂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由此转变为右倾,被一群机会主义分子所包围,丧失了革命动力,进而由中共革命的合作伙伴转变为革命对象。为最大限度动员民众参与革命,中共对从事农民运动表现得更积极主动,直指封建土地制度,瞿秋白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37]为此,中共在农村采取更为激进的土地政策,以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

中共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在对农民阶级革命动员的过程中,发展了大批农民入党,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由此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组织基础来源。中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然而,为革命之需,中共亟需更广泛的革命者参与,以宣传和组织为武器,激发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1926年8月,在广东召开“广东省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聚集了当地积极分子的代表,其中80%是共产党员。”^{[35]487}1926年8月31日,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谈话时提到:“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从全国来说,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35]422-423}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的:“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38]35}当中共党员在农民动员中占据主体地位时,也吸纳了大批农民党员加入党的组织。瞿秋白对这一现状一语中的:“在第五次大会前知识分子占多数,工人分子占少数;现在智

分子虽然走了许多,可是工人成分降至10%,极多数成分是农民(80%)”“我们并不是禁止农民入党。贫苦农民,尤其是雇农,接受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就允许他入党,使他无产阶级化。并不是因为土地革命,就是要农民来做党的阶级基础。”^[39]当然,解决土地问题,如毛泽东所言,也是扩充军事力量和物资储备的需要,“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40]

农民党员数量的增加,并不能认为中共已转变为农民党,其领导阶级依然是工人阶级,但其革命主力是农民。党在1928年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农民运动中领导的巩固,是土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密切的联系,与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是土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41]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当然是革命最彻底最坚决的革命力量,工人阶级“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向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42]在陈独秀看来,农民阶级的理论水准与战斗性与工人阶级不能相提并论,但单靠工人阶级的革命,前途并不光明。因此,从事工人运动为主的邓中夏指出:“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地系统地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①

当然,对于农民党员的大量增加,中共必须要不断提高其思想觉悟,不断整顿党的队伍,才能增强革命队伍的纯洁性、组织性、战斗性。对此,毛泽东卓有远见地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错误的。”^{[38]77}实际上,这一在大革命时期就已播下的思想火种,是中共能从一个小党迅速扩大,甚至在面对国民党政权的疯狂围堵之际,亦能做到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的主要原因。群众运动正是在中共的思想引领和动员之下,更具有政治性和革命性,在国民革命中发挥巨大力量。如瞿秋白所指出:“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开阶级斗争。”^[43]故而,中共一方面围绕土地问题,通过激进方式组织和引导广大农民从事革命运动,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党组织的整合或整顿,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两者在此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并行不悖。

五、结 论

瞿秋白认为,国民革命的进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资产阶级来指导,对于帝国主义做局部的抵御,利用所谓列强之间的冲突而苟延残喘,想镇压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处处与军阀帝国主义妥协而希望以反对“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许的恩惠;一种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帝国主义整个儿推翻,利用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冲突而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成分,集中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力,以求肃清国内一切买办军阀土豪等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动平民的压迫者。^[43]两相比较,后者显然更加坚决彻底,也更为艰险,需要强有力的革命意志和灵活的革命手腕。

中共自建党以来,非常重视贫苦大众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尤其当工人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后,

① 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25年5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118页。

为寻求新的革命力量,中共深入乡村社会,积极组织和动员农民阶级,建立农会,壮大革命力量,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中共深入基层农村,宣传革命理论,努力发展革命积极分子,以先进带动后进,广泛掀起了农民运动。国共合作时,中共在与国民党的冲突中虽不乏让步,并经受了惨痛的教训,党内亦产生分歧,但也促进了中共更为专注农村群众工作,走向独立动员农民阶级的革命之路,实现中共与农民阶级的紧密结合,不断巩固工农联盟,为大革命失败后开展土地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 [1]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63—364.
- [3]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上)[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53.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5.
- [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33.
- [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24.
- [8] 汪信砚. 李达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56.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0] 彭湃. 彭湃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1.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63.
- [12]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30.
- [13] 粤枢. 农民运动的经验[J]. 中国青年(上海1923),1924,(03)53:53—55.
- [14] 彭湃. 彭湃研究史料[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298.
- [15] 韶山衡山醴陵长沙工农兵,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党史学习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7:19.
- [16] 高菊村,等. 青年毛泽东[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242.
- [17] 静值. 农民运动的三要点[J]. 共进,1924(54):1—2.
- [18] 彭湃. 海丰农民运动报告[J]. 中国农民(广州),1926(03):1—19.
- [19] 和森. 五一特刊: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J]. 向导,1925(112):3—9.
- [20] 梁尚贤. 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11.
- [21] 本党对于农民运动之宣言[J]. 浙江周刊,1924(10):83—84.
- [22] 中共湖南省党史委. 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125.
- [2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66.
- [24] 农民运动决议案[J]. 政治周报,1926(6/7):60—61.
- [25] 绮园. 廖仲恺与农民运动[J]. 人民周刊,1926(19):13—16.
- [26] 中夏. 论农民运动[J]. 中国青年(上海1923),1923,1(11):2—4.
- [27] 河南省农民运动报告[J]. 中国农民(广州),1926(08):41—55.
- [28] 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湖南民众请愿团的报告[J]. 向导,1927(199):9—13.
- [29]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J]. 向导,1927(191):8—13.
- [30] 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J]. 中国农民(广州),1926(08):30—40.
- [31] 元法. 谁是农民运动的破坏者? [N]. 民国日报,1927—04—25(03).
- [32]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19—320.
- [33] 阮啸仙. 阮啸仙文集[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127.

- [34] 农民运动计划大纲[N]. 民国日报, 1927—05—26(01).
- [35] 中共中央党建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上)[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456.
- [36]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545.
- [37] 秋白. 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J]. 向导, 1927(195): 3—7.
- [3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5.
- [39]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07—608.
- [4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43.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32.
- [42] 陈独秀.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J]. 新青年, 1924(04, 国民革命号): 15—22.
- [43] 瞿秋白.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J]. 新青年, 1926(03): 24—44.

(责任编辑: 闫卫平)

On the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of the Peasantr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1—1927)

LIU Da-yu, HOU Ming-yue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ource of revolutionary forces, that is, who the party needs to organize and rely 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problem of farmers. Especially after the setbacks of leading the workers' movement, it actively sought Revolutionary Alliance forces, carried out various forms of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of the peasant class, and organized and led the peasant cla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nt deep into the countryside to publicize revolutionary ideas in a concise and clear way, organized peasant associations to strengthen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paid attention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emphasized the goal of political struggle.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the leading power to mobilize the peasants' revolution, which laid a solid mass and class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agrarian revolution.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asant class;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